

何方
杂谈



何方杂谈

請沈志華

李丹慧

同志指正

何方



自序

1999年我办了离休手续，随即作了两件事。一件是写了一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分上下两册）；一件是写了一部自述，取名《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也分上下两册），分别由利文出版社和明报出版社在香港出版发行。在此期间，还写了一些零散文章，接受了一些访谈。文章和访谈内容，有些是有关国际形势与外交问题的，有些是关于中共党史和国内时政的，大都先后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过。这本小书就选自这些文章和访谈，只是全按未经删改过的原文刊印。由于内容庞杂，书名干脆命名《何方杂谈》。

本来，在写完《党史笔记》和《自述》两部书后，还计划写一部《共和国前期外交的探讨》。这个“前期”，主要指建国后头三十年。因为那个时期我一直在外交部，所谓近水楼台，了解的情况可能稍多点。而且我对这三十年的外交路线和对外关系还有着和官方史学根本不同的看法。但是只写了个开头：《卷首语》和《绪论——建国前后的国际形势》，由于身体不适，工作就停下来了。按照原计划，还有九章有待续写，至于何时能完成，已很难肯定。有鉴于此，就先拿这已写好的两篇，作为这本集子的开头，先行印出。不过这里遇到了个难题，就是谈国际形势的文章中有一节谈到时代问题，和后面的时代问题十讲，内容基本重复。解决办法可以是将重复的部分去掉。但这又损害了全篇文章的原有体系，所以考虑结果，还是

保留了下来。另外，出于本书内容的需要，这里还从《党史笔记》中选出《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文。

其他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如上所述，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即国际形势与外交问题；中共党史和国内时政。下面的编排也就按这种分类进行。不过既然是“杂谈”，分类就不会很准确了。

需要一再申明的是，本书内各篇文章都是本人的一家之言，且带有一定的论战性，虽然都公开发表过，但并不合流。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批评。

这本小书，从倡导、策划到编排、校订，都是宋以敏一手操办的。

是为序。

何 方

2011年7月5日

目 录

自 序	1
-----------	---

国际形势与外交问题

《建国前期外交的反思》

——卷首语和绪论(2010年)	2
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十讲(2011年4月)	93
从北非中东革命看七十年来的世界潮流(2011年3月)	162
亲历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转折(2009年11月)	172
谈延安整风和某些外交工作经历	
——何方先生访谈录(2008年6月)	198
对中日关系的一些看法和意见(1997年5月)	210
增进中日间的相互理解与信赖(2002年10月)	219
突破中日僵局(2004年7月)	225
谈中日关系60年(2009年8月)	229
在日本研究所的三次讲话	
——日本研究战线上一个老兵的几点希望(2011年5月、1月, 2010年10月)	243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	
——写在“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时(2007年10月)	249

中共党史与国内时政

驳熊蕾对张闻天的诬陷(2011年3月)	258
驳柯华所谓的张闻天“反总理” ——澄清外交部1958年务虚会的一些情况(1999年)	266
缅怀一代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 ——纪念张闻天诞辰110周年(2010年)	273
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2004年)	283
中国当代启蒙的关键是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2011年)	404
沉重的反思 ——写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出版之际 (2005年)	407
读有关康生的两篇文章所想到的(2003年)	412
再谈党史文章的抄来抄去现象 ——答刘明钢同志的“商榷”(2003年)	422
何方谈党史研究:求实辨伪,秉笔直书(2010年12月)	433
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 ——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在民族自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2009年)	441
一颗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悼念朱厚泽同志)(2010年7月) ...	466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问题上的教训(2011年5月)	476
自由是民主的前提(2008年4月)	480
接受杨伟东访谈(2010年7月)	483
岁末谈形势(2009年)	503
改革开放三十年(2008年)	506
支援抗震救灾 改革公车制度(2008年)	515
释放刘志丹与痛说三门峡(2004年)	519

国际形势与外交问题

《建国前期外交的反思》

——卷首语和绪论

卷首语

很久以来，我就想对外交问题写点东西，叫笔记也好，叫随笔也好，总之是要对中国外交和外交研究表达一些与官方和主流派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为的是提供参考、引起讨论、听取批评。一直拖天，一来是离休后的十年先做了点别的事情，写了一部中共《笔记》和一部《自述》；二来是外交问题特别复杂和敏感，有时间和条件翻阅大量材料进行研究，所以迟迟不敢动笔。想一想，现在已经年届 86，如果再不动笔（因为我不会用以后就没机会了，因此决定先写起来再说。这就是大家现写的东西：既不可能全面系统，又不会提供什么新的资料，只容纳了对一些问题的不成熟看法。而且就是这样，能写多少视身体情况而定，因为终究岁月不饶人。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满六十年，无论从国内建设还是对外关系看，完全可以甚至必须分为前后各三十年、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前期可称为毛泽东时期，后期已经被普遍定性为“改革开放以来”了。这两个时期的差别，用传统称呼，就是基本路线和总方针的不同。前期执行的是一条极左路线，曾经造成许多严重后果，让人们吃了不少苦头，使中国社会停滞和倒退了三十年，成为世界潮流的落伍者。后期执行的可称为经济上改革开放的路线，虽然对前期路线有广泛的传承，特别是在维护一党专政的体制上，但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是作了根本性的修正，因而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大体上能够适应世界潮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化进程。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虽无本质改变，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但经济却得到快速发展，对外关系也有了根本扭转，因而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使人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这后期对前期不但有个传承关系，而且两者之间还有个过渡阶段，也就是逐渐演变的过程。例如毛泽东时代并没有随着毛泽东去世而结束，后来执行的仍然是他的路线，还特别强调联美反苏。直到建国三十周年时才从根本上放弃了毛的路线，其标志就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变化在外交上表现得比内政更加显著，但旧的烙印仍然长期残留。所以本书所谈对象为前期中国外交，有时也难免会稍为涉及后期。

三

建国之初，我就跟张闻天进了外交部，先后担任过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9年虽受撤职、降级、下放等处理，但总还算外交部一名工作人员，直到1979年离开，在外交部总共呆了整整三十年。约一半时间的躬身实践一半时

间的近水楼台，使我对共和国的前期外交多少有些了解。遗憾的是，由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我的所有工作笔记和本应由个人保存的材料如起草文件、报告的底稿等，都已被组织上收缴而去再无意发还。所以我对建国前期外交的了解，就只能靠个人记忆了。如果记不清楚或属道听途说的事，那就宁可弃之不用，也不勉强瞎凑。这是我历来坚持的原则，在写本书各章节时自然不会改变。这就是前面说过的，本书只谈个人的一些看法，而不能提供什么新资料的缘故。

不过，稍可弥补的是，我从事国际问题与对外关系的研究前后有五十年。进外交部后，无论职务怎样变动，一直都是从事研究工作。离开外交部重新工作，先后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和原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也是直接间接为外交工作服务。离休后虽然改行着重学习中共党史，但对国际与外交问题的兴趣仍然未减，还继续作点研究，并时而写点文章发表。这也是我现在敢于着手写这本东西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年来中国学界对外交问题的研究，对我也起到很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在建国前期，可以说没有民间的外交问题研究，只有少数机关的内部研究。群众能看到的就是政府声明、报刊评论一类东西。我也曾从事过这一工作。记得1958年大跃进期间曾闹过一阵“开门办学”，北京大学还请我给两个系讲过中国外交政策。事后听到教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老师们反映，连我讲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等提法，他们竟然闻所未闻，可见前期外交之神秘。能够公开谈论外交问题和允许民间进行研究，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但仍一再重申对外必须同中央保持一致。例如已经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在国研中心工作时，一位研究人员公开发表文章含蓄地说朝鲜战争是北方发动的，结果朝方提出抗议，外交部通过国务院外办转告中心，以此人离开中心自谋工作才算完事。

外交问题研究真正拉开帷幕，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了。这也与苏联解体、俄罗斯当局大量公布

对外关系档案有关。与此同时或稍后，中国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先后依法对过去的部分档案进行了定期解密。所有这些，都大大有助于推动中国前期外交的研究，催生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不但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历史档案材料，而且还发表了在这方面可谓数量空前的论著，对中国现代史特别是外交史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揭露了许多过去以保密为名而加以隐瞒的史实，进行了初步的正本清源。我能读到这一代学者的东西也许不多，但却受益匪浅。特别是沈志华和李静杰两位，还赠送给我已经译成中文的有关中苏关系的俄罗斯解密档案，使我了解到许多事实真相和原来不知道的东西。我现在写前期外交问题，也可说是白发人站在黑发人肩对过去的回顾。如有失误，那也是老眼昏花的缘故而不能赖别人。

四

关于共和国前期外交，想要谈的问题并不多，但涉及的面却很广，除个人的理解和记忆外，还得使用不少材料。按照学术界的传统规矩，一般都要开出参考书目和引文或依据的注释。对此，我想做一点突破。一是不列参考书目和资料，因为我觉得不太必要。说老实话，我先后读过的有关书籍、文章以至纯粹的材料也还真不能说少，也记过一些笔记，但在写本书时又不可能全都重翻一遍，因此列出来只能起壮胆的作用。例如马、恩、列、斯、毛，我大多数都读过，有些还读过多次，都列上，那是吹牛；只列其中若干卷，又没什么道理，所以还是免了的好。又如其他有关著作和文章、资料，确实读过，有的甚至看过好几遍，但是现在有人来考问，大约一定“烤糊”，那还列上去干什么？何况我写这部书，只是个人对一些问题的反思和随想，算不得学术著作，又何必装模作样呢？至于注释，总的原则是尽量从简，应当说明和需要指明出处的作注，为众所周知和较为普遍和平常的问题，也就不多此一举了。

本书所用材料和进行立论的依据，除个人的一点平凡经历外，基本上都是公开材料和别人的研究成果，所以并未提供什么新材

料，更谈不上泄密。如果有人硬要说是泄密，那只能是欲加之罪。但是同样的材料，也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和看法。甚至拥有材料最多和看得最细的人，对问题的看法却不一定对。因为比材料更重要的还是观点、方法和对材料的驾驭。这是一些西方先哲和中国学者早就论述过的。例如曾被马克思、恩格斯称道过的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就比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和机械唯物论更接近真理。这倒不是有意为自己掌握材料不多预设辩词，而是想说明即使对某一问题拥有材料不多，也还是有些发言权的理由。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推行人民公社的主观原因而论，就存在多种说法。主流的说法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为使全国人民早日摆脱贫困状态，我就不大信服。因为在明知大跃进、公共食堂行不通，并已出现饿死人现象，因而准备反“左”的情况下，却在庐山会议上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并在全党全国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无论从动机还是效果、或毛自己提倡的动机效果统一论来看，都完全推翻了这种主流舆论。另一种意见，说是为了振兴中华，一吐过去长期受美帝欺凌的满腔怒火。根据我的体会和了解，也不大像，更不用说不久后就坚持的联美反苏这一重要历史事实了。再一种说法，就是认为毛内心是想把苏联比下去，为共运趟出一条新路，生则争得国际共运领袖，死则名垂千古，这倒庶几有点像。可见，结论的正确与否并不和掌握材料的多少成正比。

五

既无什么新的资料，又不成系统（体系），写这部有关新中国前期外交问题的书，所为何来？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只是出于以下几点想法。

一是希望对外交问题的拨乱反正起点推动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掀起了一阵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之风，对国内各方面的问题都有所反思、检查和探讨。虽然由于很快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中途刹车，进行得并不彻底，但此风既起，就不容易完全压

住。例如一再三令五申，不许谈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和三年困难，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但是谈论终究禁止不了，而且除了极个别的“四人帮”残渣余孽外，即使主流派舆论也没有人敢于公然为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翻案平反。不过在我的印象中，有关外交问题却是完全另外的情况，并没有作过什么拨乱反正，反倒被认为一贯正确。毛泽东晚年把中国搞成了国际社会的孤儿，1982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要说他“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在当时我就提出不同意见，并被写进了报送中央和在一定范围散发的《简报》，自然不会起任何作用。直到现在，官方和主流舆论，都绝不承认中国外交有过什么失误。连外交部发言人的对外谈话，不管提到什么问题，都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或者“我们历来主张”等。看来，在外交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的补课，不但完全必要，而且大有裨益。这样做，既可以增进中国作为讲求实事求是和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对内也是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去掉或减少愚民政策的造假藏真，必定会获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二是希望给外交研究这个长期的禁区打开一条缝。给外交研究和讨论设禁区，那是专制独裁的需要。因为那样可以为所欲为，不受监督和批评，有利于“坐江山”的稳固，但对国家和人民却危害极大。在国际上也是瞒天过海，不敢负责的表现。例如从过去到现在，对外援助除少数例外，基本保密，大概就是担心老百姓不满和闹事。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国内饿死人数千万，不得不进口一点粮食。有一次大概是从阿根廷购进几万吨小麦，载粮船只已开到回国的海洋路上，但阿尔巴尼亚要求供给粮食，于是一声号令，运粮船向阿驶去。你说这类事情让老百姓知道了能高兴吗？又如现在，在政府无任何兼职的某些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可在访问中亚和非洲时向一些国家撒钱援助（因对国内秘而不宣，只能从外电报道中了解到一点），但却从未见到他们去宁夏、青海、云南、贵州许多贫困地区探望尚未实现温饱的群众，更不用说支援和布施了。要知道，用于援外的是纳税人的钱，怎么能背着他们去花呢？还有，由于以

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和某些后继者，不懂和不顾国际法，又变化多端，所以在外交上常造成自相矛盾和处于被动。后来不但在国际上显得尴尬，在国内也很难对人民作交代，而不能不继续进行隐瞒和造假。例如中俄边界问题，对苏“一边倒”时，一再说苏联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过了没几年，一旦交恶，又大张旗鼓地宣传沙俄根据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去 15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逼着对方以承认这点为解决边界的前提。一直到现在要解决中俄边界问题了，却不敢向人民宣传问题到底是怎么具体解决的。连官方报刊上也看不到达成协议の詳細地图。至于以前强调的唐努乌梁海和江北三十六屯不再提起，连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是怎么划分的也不便公开宣传。这类自己制造的被动还多得很。可见外交上设禁区，对当局也并不有利。因此我想在打开禁区上带个头，让外交不再对内神秘，没有必要保密的事也不必继续暗箱作业。

三是希望对过去外交工作允许争鸣讨论、总结经验教训，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如果强调一贯正确和祖宗之法不可违，那只能保护落后、阻碍进步，既不利于国际形象的改善，也会使国内群众对外交或者漠不关心，或者思想混乱。承认错误，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是一种清醒自信和坚强有力的表现。文过饰非、自命一贯正确，也许可以欺世于一时，但很快就会破灭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世时都曾以一贯正确自居，但身后不久，大概除了极少数思想顽固和别有用心的人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了。美国有人说，在朝鲜战争期间如果再同中国开战，那就将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后来这几乎成了美国人的共识，但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并未因此有所动摇。我们能说中越边境冲突只是对越南的“教训”和对红色高棉的支援，而不是什么“自卫反击战”吗？我们还有哪一个领导人敢再说波尔布特所谓一步到位的社会主义实验走到了中国的前面，值得我们学习？在国际审判波尔布特集团种族灭绝罪行时，我们党和政府敢承认和公开过去和他的关系吗？结果只能是，世界上早已公开，只有中国老百姓被蒙在鼓里。这如同时任中央总书记的

江泽民在纪念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里说刘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一样，在历史上是不会长久的。这哪里谈得上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举个并无政治内容的小例子。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时的阵容和形式，也是毛主席创办以来，历届领导都做到墨守成规，坚持几十年不变的。只见客主分坐在中间置有花篮的小桌左右，扭着脖子交谈；而只做样子的陪见者则分左右两排雁阵而坐。如有改进，也许只是去掉了毛、邓在时放置的痰盂和烟灰缸。还有，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无论时间多么紧张，事情多么重要，都得在和主席、政府总理会谈后还要挤出时间来拜会人大和政协的领导。在我们，也许是为了四套班子一碗水端平；但对有些讲求实际的客人就可能造成负担，因为他们除了听一些重复的套话和空话外，不会听到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这都实在是一种形式主义，为什么不能总结经验，作点改变呢？以前那种重要外宾来，必须有经过多日演习的千百小学生穿同样服装去机场欢迎的仪式，还不是由于李光耀的建议而取消掉的？为什么不许中国报刊谈论？只是一般说说总结外交工作的经验教训，肯定没人敢出来反对。但要真的公开讨论进行批评，那恐怕不比骆驼穿针孔容易。在这里也应该反对叶公好龙的现象。

以上所提三点，只是表达个人的希望，能不能起作用，在目前情况下，我是没有信心的。

(2008年6月22日)

绪 论

建国前后的国际形势

讨论共和国前期的外交，不能不先谈一下那个时期的国际形

势。因为所谓外交，顾名思义，也就是对外关系和国际往来。国际形势对外交的影响并不亚于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所以要谈一个时期的外交，就必须了解当时的国际背景。然而建国以来的国际形势千头万绪，这里不可能作系统阐述，更不会面面俱到。我只想就几个有不同看法的问题谈点个人意见，并不是说这一段时间的国际形势只有这几个问题，也不表明哪个重要或哪个次要。作此说明后，就让我们讨论以下几个问题：我们所处的时代；全球化与中国；二十世纪的国际形势和社会潮流；美苏冷战与中国。

第一节 我们所处的时代

——新中国诞生在两个时代的交接期^①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分为前后各三十年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虽也取得一些成绩，但却是犯有严重错误和存在沉痛教训的三十年。后一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开放，虽然缺少政治改革，但还是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达到初步小康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三十年。造成两个阶段不同的重要原因，就是对时代及其特征的判断不同：前者坚持仍然是战争与革命时代，因此继续以世界革命为总路线和总政策；后者认定时代特征已转变成和平与发展，总路线与总政策也改为集中力量发展本国经济并维护世界和平。不同的判断导致不同的结果，证明了对时代的认识判断的重要。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正好是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结束及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开始。这就是建国前后面临的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

^① 关于时代问题，二十多年前我曾将几次报告整理成一篇文章，以《我们所处的时代》为题发表。后来又和其他有关文章合并成一本《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印出。离休后由于改行学党史，有些观点如对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看法，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对时代问题的理解并没有改变，所以详细阐述还可参阅该书。